

把握系统观念的三个基点

□ 古 荒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坚持系统观念明确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之一，体现了党在科学思想方法上与时俱进的新进展新创造。系统观念既是先进科学理念的提炼升华，又是辩证唯物论的当代发展；既是对复杂性时代图景的深刻反映，更是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根本性、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发挥重要的方法论指引作用。

立足整体看系统

整体论是系统观念的首要观点。没有整体性视野就难有系统观念。坚持系统观念，要求在认知和处理问题时，必须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来绸缪布局，把整体的效益和功能作为根本归宿和出发点。

首先，需要明确系统整体之于构成要素的统领地位。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按一定层次和方式组成的统一整体。在系统与要素的关系中，整体处于支配地位，要素不能凌驾于整体之上。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整体大于局部的总和，整体决定局部。毛泽东则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个道理。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各区域、各部门、各产业、各群体，都是经济社会发展大系统的组成要素，也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战略全局中的有机构成，不能脱离战略系统的整体推进获得孤立的发展与成长。

其次，需要厘清关键要素之于系统整体的不可或缺性。系统之于要素虽然处于优势地位，但倘若只见整体、不见局部，同样会步入思维误区乃至决策困境。尤其是一些关键要素、层次及子系统，它们是系统整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维持系统整体的形态、特征、功能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旦轻视甚至忽略了这些事关全局的关键局部，就会对整体造成严重伤害。轻则形成影响系统整体功能的短板弱项，重则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瓦解。就如同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的总体目标是整体相关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每个方面都不可或缺，必须整体统筹。又比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便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工程，每一个“全面”都是极端重要的子系统，同样缺一不可，必须协调推进。

再次，需要辨明系统整体之于构成要素的制约性。单个要素的性质功能在一个有机整体中可能得到成倍放大甚至质的跃升，而脱离有机整体的孤立要素则可能功能骤减甚至丧失。质言之，处于系统之中的要素，其性

能会受到系统的整体制约和规定。恩格斯就曾说，“手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只是整个具有极其复杂的结构的机体的一个肢体”。作为有机体的一部分的手，才能够具备劳动的功能，一旦脱离整个有机体，手就将丧失其劳动器官的本质规定。系统中的要素与其他要素都处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这就使其和孤立的同一要素展现出质上的差异。这就启示我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教育、国防等各项发展任务的实现都会受到系统的整体制约，脱离其他方面配合的孤军深入式的单项改革是难以成功的。

立足协同看系统

协同论是系统观念的核心观点。没有协同性视角就难以优化系统效能。坚持系统观念，要求在发现 and 解决问题时，必须着眼于系统中各要素间的关系来协调机制，把结构调整作为优化系统效能的基本途径和着力点。

自觉协调结构关系推进系统功能优化。结构是系统中诸要素按一定秩序、一定比例、一定层次、一定形式发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不仅取决于构成要素的性能，更决定于要素之间相互联系所形成的结构形态。同样的碳原子，按不同结构组合，或为金刚石或为石墨，二者效能大相径庭。显然，结构不合理，构成要素相互掣肘，功能内耗；结构合理，则能协同各方要素与有利条件，不断优化系统功能，还能带动构成要素性能的有效提升。故而在战略决策时，不仅需要研究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更要重点研究系统内在的各类复杂结构，力求通过调整和优化结构，协同推进系统整体目标的实现。就经济社会发展大系统而论，既要调整产业结构、消费投资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又要调整供给需求结构、国民收入结构、城乡结构等，从而形成相互配合促进的强大合力。

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科学决策不能单兵突进，但同样不能平均用力，而是需要在配套协同中有效地突出重点。同一复杂系统的内在联系，是错综交织甚至千变万化的。这些结构关系绝非均质，有的对于系统效能及演化起到的作用甚微，而有的却是发挥关键性甚至决定性作用的。黑格尔曾说，“相互作用是事物真正终极的原因”。作为普遍存在和终极原因的“相互作用”正是辩证法所谓的“矛盾”。有的矛盾关系是次要的，有的矛盾关系则规定着系统整体与其他矛盾关系的发展。毛泽东曾说，“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不仅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更要善于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努力寻求实现系统整体效能的最佳方案。与此同时，也必须兼顾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以整体推进支撑重点突破。

应用协同机制主动干涉系统的涨落进程。矛盾的运动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事物的变化发展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从系统的演化形态概观，呈现为系统的涨落波动。平稳波动往往能够推动系统进步发展，剧烈波动却可能给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带来严重危害，如经济周期涨落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等。鉴此，应在加深对系统演化趋势认知的基础上，有预见性地采取相应的协调措施来干涉系统的涨落进程。比如，运用宏观调控介入过冷或过热的经济趋势来减缓系统波动；还比如，打通经济循环堵点，加快系统的反应速度，从根本上削减系统大起大落的危害等，从而推进系统走向动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立足开放看系统

开放论是系统观念的必备观点。没有开放性视角就难有系统活力。坚持系统观念，要求在处理系统和环境的关系时，必须着眼于系统自身与外部环境的开放循环，把有益的物质、

信息、能量交换作为中心诉求和交汇点。

系统可以有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之区分，但封闭系统往往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任何存在的系统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系统以及外部环境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系统一旦走向封闭，即切断了系统自身与外部环境间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传递，也就终将走向无序、沉寂直至解体。可见，开放性是系统维持自身结构和不断发展的必备条件。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决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系统会走向封闭，恰恰相反，中国开放的步伐不会停止，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新发展格局强调的是以国内大市场为基础的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相得益彰的开放双循环，这不是被迫之举与权宜之计，而是立足系统客观实际和外部环境的战略先手棋。

此外，开放仅是系统演化发展的必备条件，这并不意味着开放必然导致发展。恰恰相反，许多系统在开放中不仅没有发展起来反而走向了崩溃。究其原因，就在于系统从外部环境引入了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物质、信息和能量。开放的经济社会发展系统会引入有益的技术、资金、人才等等，但同样可能输入危及国家主权政权、核心意识形态乃至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风险和挑战。对此，必须给予审慎甄别并重点防范。我国不仅要在开放中引入有利于系统自身进步的各种有利因素和条件，同时也还需要在与其他系统和外部环境的交流融通中带去有益于世界发展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更大的系统走向共商共建共享。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诸多复杂挑战，我们决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铿锵有力的话语。习近平总书记还在企业家座谈会等多个场合反复昭示和表明这一鲜明立场与态度，可谓语重心长、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催人思考。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是与历史真相站在一起，不被现实谎言和假象所迷惑与干扰。历史的原貌原样虽然已经被岁月尘封，但它原本是怎样的就是怎样的，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历史真相不是哪股势力说几句否定、歪曲或恶意的话就能被改变的，不是哪个人去“戏说”一通嘲弄解析一番就能被肢解的，它既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为有人捣乱而被篡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是要敢于坚持历史之本来、历史之本源和历史之本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捍卫历史真相、坚守历史真实。这就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看待历史、面对历史，不为现实中眼花缭乱的奇谈怪论所蛊惑，不为形形色色的噪音、杂音所干扰。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是与历史进步潮流站在一起，不被现实逆流和“回头浪”所裹挟与淹没。历史好比大江大河，总是以它的坚毅和执著滚滚向前，奔向充满“诗和远方”的大海；历史又好比巨人的脚步，总是以它的坚定和果敢大踏步向前，爬坡上坎。流水是有其内在走势和走向的，由上而下是一种“顺流”，自下而上则是一种“逆流”。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难免会遭遇“暗礁”“漩涡”的羁绊，有时还会被“回头浪”呛着，但这些都阻挡不了“一江春水向东流”。比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公平正义等始终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而对抗霸凌、唯我独尊、我行我素等则是“暗礁”“漩涡”和“回头浪”，它或许能羁绊一时、影响一事，但因为反动、落后和倒退的属性而行不通、长不了，也绝对成不了气候。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是与历史发展规律站在一起，不被现实反常和“回光返照”所蒙蔽与带偏。规律具有必然性，它是不可抗拒的，也是不可违背的，任何抗拒和违背不但在规律面前会碰个头破血流，而且会被规律无情淘汰。现实中也许会听到或看到一些违反历史规律的人与事逍遥甚至嚣张，比如，搞这“独”那“独”的一小撮们，他们或许能蒙蔽和蛊惑一些人，而且表面看有的有时还跳得很高、闹得很凶，但因为它违背国家和民族大义，开得了历史倒车，是一种“回光返照”，因而注定会走向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 徐文秀

失败和灭亡。遵循和顺应历史规律，便走在了历史的大道、正道上，就不会被现实的岔道、歪道带到歧路上去。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得有正确的历史观作支撑、来托底。正确的历史观就是正确地“观”历史，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历史，把现实中的人与事放置大的历史背景、历史坐标和历史长河中去考量，这种辽阔的大视野和厚重的大历史观，可以让我们保持一份清醒、理性和自觉，保持一份从容、淡定和冷静。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得有清醒的头脑、坚韧的定力和无畏的精神，只有与历史正确而不是错误、进步而不是落后、主动而不是被动、积极而不是消极站在一边，才能立于时代的潮头、顺应历史的潮流而不屈不败。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延安经验

□ 马君俊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成熟和壮大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特殊时期。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共产主义信仰，坚守人民立场，坚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认真研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宝贵经验，对于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始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始的。一方面，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地位和功能特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提供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领导干部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必须首先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看家本领，从哲学的高度来总结历史经验，扫除教条主义思想，贯彻实事求是

是的思想路线。另一方面，这是由深刻总结当时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毛泽东强调，“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立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中国共产党在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路上，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革命之所以失败，甚至一度遭受毁灭性打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问题关乎革命的成败。党中央到达陕北后，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就是一个极为紧迫、极为关键的问题。

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为了从思想理论上彻底清算

“左”倾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毛泽东来到陕北后，废寝忘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不仅精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而且定期组织召开哲学座谈会，一般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持续到深夜十一二点钟。当时主要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讨论，每次讨论总是毛泽东提出一些问题，艾思奇、和培元等先讲，然后大家各抒己见。讨论时气氛很热烈，大家毫无拘束，畅所欲言。集体研讨的过程就是训练哲学思维的过程。这些哲学思维的精华全部凝结在毛泽东的著作中，特别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简称“两论”）中。“两论”原是毛泽东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哲学讲演用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一部分。在“两论”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揭露了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

教条主义的错误，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极大地推动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观点。《实践论》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实践第一的根本观点，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实践逻辑，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论基础。从而在哲学认识论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要立定中国革命斗争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理，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角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

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论》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重点论述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之辩证统一的原理，特别强调了矛盾的特殊性，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辩证

逻辑。《矛盾论》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一次出色的“说明和发挥”。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深刻阐明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依据。

学好哲学讲好哲学 用好哲学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丰硕，从这些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延安时期的理论贡献不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而且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大众化的典范。这些哲学著作紧扣时代脉搏、回应时代问题，力图用最通俗的语言把最深刻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论是广大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都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延安时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让中国人民深表认

同，更深受中国人民喜爱。能够做到这一点，绝不是靠某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达成的。讲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是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了真正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成立了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的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以及专门从事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的各类学习小组和研究会，而且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行政学院、军事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30多所干部学校。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建立的“延安新学会”，其宗旨是研究、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汇集了当时延安的一大批专家学者和党员干部，举办各种哲学报告会、哲学讲演、座谈会和哲学年会，影响广泛而深远。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开始的，但并没有停留于一般的哲学理论，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思想基础，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艺、新闻、历史、军事、统战、党建、民族、宗教等多个具体领域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